

以上三點至少是我們對於政治多元主義的簡單評價，也是我們對於主權的一種看法。論述至此，這個在政治學上最複雜微妙的主權問題，似乎仍未得到解決；但是主權之有無，本來祇看你對於主權所下的定義如何。這種名詞之爭，僅為一種形而上學的遊戲，恐永遠得不到真正的解決。不過最後有幾句話應該是真實的，便是：一元主權論。

英 國 民 主 思 想 的 新 趨 勢

吳 恩 裕

近幾年來英國出版的政治思想書籍，表現一種新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基本特徵，便是使政治思想的對象具體化；而「洗格林」(T. H. Green)，布來得雷(W. H. Bradley)，鮑山葵(B. Bosanquet)那種政治思想與哲學倫理不分的積習，本文即將把這種新的趨勢及其對於民主思想的影響加以敘述與分析。

一九四一年林賽(A. D. Lindsay)著「近代民主國家」(Modern Democratic States)一書，書中討論政治理論的性質，認為我們只能研究近代國家，中古國家，或古代國家，而絕對沒有一個抽象的國家，可供研究。因此，我們也只能有近代國家論，中古國家論，或古代國家論，而不能談什麼抽象的哲學國家論。「哲學的國家論」(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一名詞，本是鮑山葵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不是對國家作一種抽象的哲學研究。霍布浩斯(L. T. Hobhouse)在一九一八年，曾駁斥這種抽象的哲學研究，認爲祇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國家論(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林賽移其「近代民主國家」一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即揚對具體的，特

殊的國家研究之旨，實為一種新的趨勢與態度。

因為注重具體的，特殊的國家之研究，所以政治思想的目的與功用，也自然改變了性質。因此，林賽強調區別兩種政治理論：一種是政治空想(Political utopia)，另一種是可以實施的理想(Operative Ideal)。前者是對於國家抽象研究的結果。因為是抽象玄想的結果，所以它便自然不接近事實，並且也自然就不能應用於事實上去。後者乃是對於正在運行中的國家(operative states)的研究。因為是對於實際國家的研究，故可探求實際國家的利病，詳情，而創造可以「見諸實行」的理想。這樣，則政治思想的功用，便不再囿於玄想的自慰，而要切於實際，有備於實際。

林賽所揚之新義，凡治政治思想史者，固然聞之必感新穎可喜。但我們考察英國當代政治思想界，實有人遠在一九三五年就顯然有這種論調。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H. J. Laski)的「國家之理論與實際」(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即於是年出版。該書第一章講「哲學的國家概念」，第二章講「實際世界中之國家及政府」，這就可謂：以哲學的國家論與現實的國家論對比。而拉斯基亦駁斥哲學的國家概念，認為不切實際，空談好聽名詞，神祕理論，於事無

是現實時代的產物，在許多場合，此種理論確能剖明政治社會的事務與真理。雖然它的缺點是缺乏系統及一貫性，明為「實用」("practical")，卻尚難達到真正實用的程度，一切還有待政治多元主義者自己進一步的整理和發揚。

補。但在第二章中，拉斯基則討論一種能夠說明實際政治的理論。其主要的精神，即在把政治理論的研究對象，由哲學的國家概念，轉移到實際世界中之國家及政府上去。

唐納教授（R. H. Tawney）的思想也很切實際。他以經濟史方面知識基礎，而對於社會及政治理學有所貢獻。一九二一年他的「貪求的社會」（Acquisitive Society）一書問世，其中就具有這種精神。

例如私有財產一問題，我們曉得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已有取消的議論。後來的政治思想家，有的擁護私有財產制度，有的主張取消私有財產。聚訟紛紛，莫衷一是。但是，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細心分析這私有財產中包括着一些什麼項目！他說：地租，利潤，版稅，專賣權等等，都是私有財產。假如談擁護私有財產，究竟是指那一項私有財產呢？若主張取消私有財產又是以那一項私有財產為對象呢？唐納認為：空談取消或擁護私有財產，都祇是談抽象的名詞，都是最不切實際的思想。如果切於實際，我們顯然不能以資本家利潤的私產和個人著作版稅的私產，相提並論。祇有這樣把討論一步步逼近具體事實的結果，纔能對於問題的結論，有所窺見；纔能對於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用的方法。

他這種研究的精神，在最近的著作中，亦可看到。唐納在他給一九三九年麥耶爾（J. P. Mayer）編著的「政治思想——歐洲的傳統」（Political Thought: The European Tradition）一書的序文中，就有同樣的見解。他以為：自由，平等及其他抽象概念的意義，都是與特殊歷史時期有密切關係的。他的意思是說：每個歷史時期所爭取的自由，所企求的平等，都自有其特殊的性質，而絕不相同。我們如果研究政治思想的方法，可謂最切實際的了。

上述這些見解雖然不是一種有組織的運動，都是無意中顯出來的一種共同傾向。這種傾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意義就是：使令政治思想的研究撇開哲學的玄想，而轉向具體的事實；不再以抽象的國家觀

念為思想的對象，而以具體的實際的國家為研究的材料。這種趨勢是值得注意的，因為，誠如唐納所說，『政治理學比最社會的科學還要更社會一些』（見上述 Mayer 著的序文）。離開了具體的社會，便無法做政治理論的研究了。

一

在政治思想中，這種逼近現實的趨勢，自然也會影響到民主的思想。有些政治思想家，往往專喜歡講民主思想的基本假定。例如說：民主是人民代表的討論政治，其統治乃是得到人民同意（Consent）的統治。這種政治可以給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又能保持他們之間的平等；因此，這種政治乃是最能尊重個人人格，發揮個性，而又能顧及公共福利的政治。在政治理論的領域中，這種基本問題的討論，和基本概念之釐清，當然自有其重要性。

但是整個政治思想既逐漸逼近事實，則民主的思想也不能例外。

空談政治思想中的抽象命題，固然無益於實際；空談觀念中的民主，也不能實際應用。此其原因即在：政治思想的最終目的是在見諸實施，並且實施後能給予人們以福利。一種思想的自身和它實施的結果，純然是兩回事。當一種制度實施之後，除了其自身之外，又加上一切的環境條件，則其結果自然會不同。在某種條件下，在某一環境中，一種制度的實施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在另一種條件下，另一種制度，或一種可以實行的思想，不能專談其本身的好壞，而必考慮它在某種條件下，某種環境中施行的實況一點。一九三五年拉斯基教授在「國家之理論與實際」一書中，即有這種主張。

民主思想的新趨勢，最根本的一點，便是近年來談民主的政治思想家，認為實行民主制必須有適當的社會經濟背景，否則不能收變民主政治的實效。唐納在其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論平等」（Equality）一書中，即已指出現代社會中政治理論與經濟制度不調和的現象。他認

爲民主制度所以不能充分發揮其民主性的活力者，就因爲它所存在的一種社會的力量，它應該爲社會人羣造福，原來可以是與民主不衝突的。但在現在社會中，經濟力量握諸豪富的私人之手，這種經濟力量變成了私人憑分享樂的工具，而與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s）乖離了。在此種情形下，真正的民主根本不能實現。

一九四二年，唐納又寫「英國何以要戰」（Why Brit. in Fight）

一書。雖然是一本小冊子，但其中頗多精確的見解。他在該書中對於民主政治與經濟制度的看法，仍然和他在「論平等」一書中的見解一致。而且他的詞氣，又更爲堅決了。他說：「民主麼？它是好的，但這還不夠！」他的意思是說：民主制度不成問題是好的制度，但祇有這好的政治制度，還是不夠，必需適當地經濟背景爲之配合纔行。當他論及英國的民主政治時，他說：「大體言之，我們的政治制度（本文作者按：指英國的民主制度）是我們可以驕傲的源泉。我們的經濟制度，以及建築在經濟制度上面的社會制度，也應該同樣纔是；但是事實上，它們並不和我們的政治制度一樣」。這幾句話明白地告訴我們：英國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都還沒有達到民主的程度。唐納認爲這乃是一樁遺憾。

唐納在同書中認爲：現在已到了時機，英國再不能使經濟活動的目的，當做個人金錢競求的一個偶然的副產品；我們應該給予經濟活動以一個有意識的目的，而「那個目的也是，或應該是，很明顯的了：它應該是用集團的努力（cooperative effort），征服自然，而謀有所服從於人類」。這幾句話雖然簡短，卻說明了整個人類前途途中，應該採取的正確方向。他的書本來是討論英國戰爭目的之作，故以「英國何以要戰」名書。英國戰敗德國並非基本的目的。基本的目的應該是：推求戰爭基因，檢討自己國家制度實況的缺陷，而急謀補救。這缺陷，在唐納看來，便是英國經濟社會制度不能與政治制度調合。至於補救的方法，他認爲只有使工業金融的力量都充分發揮社會

的職能（social functions），而用全力從嚴自取，以謀盡顧人情，他的具體的辦法，則係一、由國家系統制信用政策（credit policy）以避免或減輕循環性的不景氣現象。唐納認爲經濟的不景氣之能造成困苦與浪費，除了戰爭之外，是再無倫比的了。二、其他工業，如運輸，煤炭動力，軍火，鋼鐵，土地利用，食物生產等等，亦均應歸國有或國家管理。三、應設立計劃及資源供應機構，俾易生實效。在英國此種機構之設立，唐納認爲實爲戰後刻不容緩的要務。

唐納以爲必須對於整個經濟制度改造，對於公私的企業改變傳統的觀念，然後纔能產生真正的民主國家。所謂真正的民主國家，亦即一個「由全民的代表們來管理，管理的目的是爲了全民的福利」的國家。總之，他認爲：倘欲造成真正的民主國家，必須把該國家中尚未民主化的各部門，都促其民主化。

關於實現民主制度必須有適當的經濟背景一層，拉斯基教授講的更爲清楚。他在一九三七年給其舊作「近代國家中之自由」的新序，以及一九三八年爲「政治典範」所寫的新緒論章中，都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茲將拉斯基關於這方面的意見略述如下。

拉斯基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政治典範」中，本已略及民主制度與其經濟背景的關係。關於此點，我們可以由他討論自由，平等，財產，經濟制度各章中，窺知其大要。但他最明顯的敘述，則以上述一

九三八年所寫那篇新緒論章，爲最重要。在這一章裏面，他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人們都以普遍實施民主制度爲最高的政治目的。但大戰以後民主的高潮逐漸低落。其原因即在政治民主並沒有解決真正正的問題。學者們的空論以爲形式的政治民主本身即爲一良好的東西，而毫不顧及它置身於其間的經濟背景，更是萬分地不合理。

他以爲在當前，我們要分析任何國家（除蘇聯外）的政治制度，必以在各該國流行的資本主義經濟背景爲出發點。如英國和美國的民主制度，都以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爲其經濟背景。我們一經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其政治的民主和經濟的資本主

122568
義，是絕對不相容的。何以呢？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少數人領有生產手段，其生產的目的在於為少數資本家賺得利潤；反之，民主的主要要求則是運用國家的權力為全民謀增進物質的福利，並且民主要求全民有選舉權。但現代國家的機構卻是直接間接受資本家所操縱的。

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能保持適當的均衡時，平民的政治要求，自然可得到相當的滿足。當生產過剩，分配不流暢時，則根本無法滿足人們的提高物質福利的需要。於是民主制度便遭到了它的危機。也可以說，民主制度走上了十字街頭。它一個前途是：被法西斯主義的消滅，根本不顧平民的福利；另一個前途是實行社會主義性質的立法，徹底改造國家的經濟基礎，使其適應為全民謀物質福利的目的。拉斯基教授認為：把民主制度當做一種治理的方法（*method of Government*），它並不比任何其他制度有遜色。它當前的問題是在：政治民主的目的與經濟寡頭制度的目的衝突。這個矛盾的開展不走法西斯的路，便定改造國家經濟基礎的路，此外別無他途。

但上述是他在一九三八年的見解，他這種見解雖然和現在的主張仍無多大出入，但他當時在上述二書的序文中，卻對民主前途表示擔憂。他在「近代國家中之自由」的新序中竟擔心：如果法西斯的勢力

繼續增高，征服弱小，則人類文明難保不重入黑暗時代（*Dark Age*）。在目前盟國最後勝利在望，法西斯勢力行將消除之際，民主政治已有走入上述第二條路的可能。也就是說，民主國家有徹底使其經濟組織與其政治民主調協的可能。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當代革命的思想」（*Th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一書中，就有這點主張。並且他認為英國在戰時即應開始向這種偉大的改革上努力。最近他那篇「中國勝力展望的感想」（*Reflec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Victory* 譯文見本年十月八日大公報），對於中國，也

的物質及精神生活水準，而能充分發揚中國人民的智慧，以供獻於人類。

二

綜括上述，可以說英國民主思想的新趨勢，乃是受了整個政治思想的新趨勢的影響。因為先對壘制的政治思想改觀，認為講政治思想必須腳踏實地，正視事實上的國家，所以講民主也就不能再固於分析形式的民主制度，而必在其事實背景中探究它的性質及功用。一在社會經濟的背景下來看民主制度，則可以發現它和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根本衝突。結果他們主張保留政治民主，並且把政治的民主擴展到一切經濟社會制度上去。他們擬議的經濟機構，雖有側重國家統治某些經濟部門，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不同，但其已放棄「自由放任」的傳統，而趨向於真正的「計劃」經濟，則無可否認。

英國民主思想的這種新趨勢，有沒有受其他派的思想所影響呢？如果受了影響，究竟受了那一派的影響呢？講到這個問題，我們不免對克老斯曼（R. H. S. Crossman）於一九三九年所著「英國政治思想」（係 J. P. Mayer 的 Political Thought: The European Tradition 中之一章）中的話，有所懷疑。他說：「……在英國一向沒有產生一種根據馬克斯派或無政府派哲學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學說（*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照我的看法，以上所述英國民主思想的新趨勢，就正是受了馬克斯派所影響的產果。不但此也，就是整個政治思想逼近具體國家而不談抽象的範疇概念，也與馬克斯的理論，不無理論上的關聯。試把我們的看法，略述於下。

先說整個政治思想。我們固然不能說英國最近政治思想的新趨勢完全受馬克斯派理論的影響，但我們須知：遠在此派之前，馬克斯談國家，就分明提出：是封建社會的國家抑資本主義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抑無產者專政的國家的問題。他不講空洞抽象的國家。用考爾其（Koreb）在其一九三七年所著「卡爾馬克斯」一書中給他取的名

任何抽象名詞都是名詞，談到實際研究的對象，都是歷史某一種特殊事實，沒有抽象普遍的歷史事實。不但該國家如此，其他如生產方法、社會形式，都是特殊的歷史事實，絕沒有普遍抽象的生產方法、或普遍抽象的社會形式。這一點可以說與英國近今講特殊國家的國家學說，至少不無理論上的關聯。

至於民主思想的新趨勢，則可以說是絕對實際受了馬克斯派的影響。我們於此，有兩個理由。第一，在理論上，所謂經濟影響政治，所謂資本主義不能實現民主理想之自由平等，根本都是馬克斯的思想。至於計劃經濟也是《資本論》第一章就暗示了的思想。唐納所主張的：使人類經濟活動的目的不再為私人金錢攫取的動機所支配，而要用有意識的目的來安排統制，則更是馬克斯「資本論」的中心理論。稍有近代政治思想史者，一讀上述唐納及拉斯基兩教授的見解，即可窺見其所含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因素。

第二、就事實上說，英國當代學者，很多承認馬克斯某些見解正確的。柯爾 (G. D. H. Cole) 在一九三八年所著「演變中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Evolution) 一書中，承認馬克斯研究英國工業革命後政治社會經濟歷史的成績，為英國人之所不及。唐納在一九三三

關於國民大會的二三問題

戴文葆

在訓政時期內，中央政制的重心在於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政治會議，依照十七年十月三日中常會通過的訓政綱領，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全國國民行使政權；而在憲政時期中，中央政制的重心，則在國民大會，依據國父手訂的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

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又在孫文學說第六章規定『人民……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由此可見，國民大會實為憲政時期行使政權的最高機關。民主國家的憲法中，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規定，已成為今日不易之鐵律。然而全

家論才在一九三八年尾出版的「英國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England)，更以上述的理論說明英國政治機構的利病。英國的費爾德 (F. C. Field) 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的哲學雜誌「心」(Mind) 上有評拉斯基教授「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文，他把拉斯基教授叫做「溫和的馬克斯主義者」(Moderate Marxist)，可見其他英國學者，也有和我們一致的看法。

克老斯曼在上述書中結尾說：『幾百年以來，英國頭一次不但缺乏一種顯明的哲學（本文作者案：指政治思想），而且需要這種哲學』。如果克老斯曼所認為迫切需要的政治哲學，是他上文所謂『根據馬克斯派……哲學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學說』，則我們可以說，這種政治哲學已經在滋長着了。本文所述英國民主思想的新趨勢，就正是這種政治哲學的雛形。